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李遇春 著

阐释的诱惑
触摸历史真实
理性的烛照
破译精神符号

话语分析
秩序在规范中生成
心理透视
人性在命运中浮沉

权力·主体·话语

QUAN LI ZHU TI HUA YU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不是怀旧
· 今时代已远去
· 非美解构
· 段记忆被湮没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主体·话语: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李遇春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

ISBN 978-7-5622-3517-0

I. 权… II. 李… III. 文学研究—中国—1942~1976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839 号

权力·主体·话语

——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李遇春 © 著

责任编辑:周柏青

责任校对:章光琼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37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7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33.00 元



李遇春

1972年生,湖北新洲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1990年进入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学习。1996—2002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另有《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第二主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协助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Quanli · Zhuti · Huayu

权力·主体·话语

—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柏青

责任校对：章光琼

封面设计：甘 英

新版总序

王先霈

这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从开始出版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累计共有九种，虽然先后有过加印，也还是都脱销了。出版社要出新版，在版面设计上作改进，作者们也愿意借此作或大或小的修订，同时，还会有若干新著将要陆续增加进来。所以，编辑同志嘱我补写一篇序言，看来，确实是有此需要——需要对原来的设想作某些修正，对丛书策划中新的设想作一交代。

当初，设计本丛书的时候，就是与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相配合。我在原来的总序中说的，丛书的作者们，也就是教研室的成员，大家在学术上相互呼应协作，并且为下一步理论上的整合作准备。现在看来，这一句话要作分析：“呼应”是教学与研究的客观需要，教研室的成员们在教学任务和研究方向上有所分工，在一个集体里必须协调、默契，也必定会彼此影响；“整合”这个词儿则未见准确——每个人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整合。学术群体的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学术群体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各人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自选课题做起来兴趣浓厚，有利于扬长避短。至于群体内部观点的接近，研究范围的接近，研究风格的接近，以至于课题的合作，应该是顺乎自然，不必强求。在这几个方面有合有分，分而渐合，合而复分，都不是坏事。至于青年胜过老年，学生超过老师，更是进步和兴旺的表现。我们教研室现仍在岗的同事都比我年轻，怀有对

新思潮、新事物的热情和敏感，我从他们那里时常受到激发和启迪。现行的学术体制中，“计划”的色彩较浓，对学术个性的养成和发挥有些妨碍，最终也不利于真正意义上学派的形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小集体，在学科建设中，只能是尽可能尊重每位成员的个性。随着中青年同志渐趋成熟，我们这个集体的研究课题，也不再停留于文学批评，近几年在德国古典美学和东方美学领域，在大众文学理论领域，在比较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都有新的可喜的成果。这也是我们策划本丛书新版的基础。

从我们已发表的成果看，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时代特征不够鲜明，较少回应当下现实的尖锐问题。这可能与我们长期教学负担过重、难得有整块的时间集中精力于一个课题有关，但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学术性格和研究心理上去寻找原因，并尽快予以弥补。近几年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博士，有的人学位论文比他们的导师更有锐气，这是值得深入反省的。前面九种书，是20世纪的产品，在21世纪，新版的这套丛书各册的撰写，希望既踏实沉稳，又表现出更大的探索的勇气和更强的创新的欲望。同事们正从事于多种重要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不断地问世，有理由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充满信心，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

2004年7月28日夜11时

暑热中于武昌桂子山

总 序

王先霈

本丛书的作者们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及相关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聚合在一起，撰写这一套丛书，其整体构想是，以文学批评论为中心，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在世纪转换时期文学理论的变革、更新。

关于文艺学研究的改革和开拓，早已为国内高校中文系教师以及教育界以外的学术同行所充分重视，并且已经有许多成果问世。粗略地说，人们的努力是在两个方向上，一是从一个个具体学科问题入手，诸如形象思维问题、悲剧问题、形式美问题、典型问题、文学语言的功能与性质问题……寻求新的看法、新的结论，而在此种寻求过程中间调整或改变旧的学科思维习性和思维方式，锻制新的研究方法；一是设计新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包括确立新的逻辑起点、新的核心概念，重组基本范畴与命题。显然，后一种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我一直觉得，从事这种工作的时机还远不成熟，因为，它还缺乏强有力的哲学的支持，还有待一系列重大学科问题的突破性进展作基础。眼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甚至没有一个迥异于古代的与西方的、为大家共同接受并在理解上少有歧义的术语系列，争论和交流常常在语义层面上就遇到阻碍；而这种术语系列的形成和获得公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的新的理论体系，是难以做到坚实牢固的，更不可能严密深邃。所以，在文艺学建设上，我赞成多研究问题，不

轻言重建体系；同时，在文艺学内部，把理论的抽象同文学史的总结、批评实践的深化更紧密地结合。

文学领域的变革往往首先从创作上发端，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也是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内容上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小说、诗歌、话剧剧本文体观念的变化，艺术形式的大范围大幅度的蜕变，掀起一股股新潮；与创作相依相连的文学批评不能不对之作出反应，由此导致批评自身的更新；文学批评对作品、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判断、阐释需要明确的原则作依据，于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就必不可免了。在这里，文学批评是中间的富有弹性的更加活跃的环节。不管出于何种心理，文学批评比之文学理论总是受到各方面更多的关切，作家、读者和社会管理者都不能完全漠视文学批评，即令他们对文学理论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是说明作品的意义（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那他还只是一个通俗的解说者，只是一个书评作者，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还应该揭示文学作品的意义如何产生，如何被接受者体认，指出文学作品生产和传播的种种规律。进一步说，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作为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的批评论，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同样，一个文学理论家，如果对当代的巨大而深刻的文学变革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不能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怎么能指望他为阐明这种变革提供有用的理论武器呢？

从上述考虑出发，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从1981年起逐步建立了文学批评论的教学和研究的专门队伍，十多年来，开设了文学评论课程，编写出版了题为《文学评论教程》的教材，培养了若干届文学批评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把这一工作推进到新的层次，是我们20世纪90年代的新目标。在我们看来，无论在文学批评的观念上，还是在文学批评方法或批评切入文学的角度上，以及文学批评论研究的路径上，都要抛弃

单一化、凝固化，而走向多元化、开放性。80年代后期，我们曾提出建设“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90年代初期又曾提出建设“圆形批评”。那些，是就批评观念而言，是针对着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也是针对着片断的、直感的、随意的、散点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希望达成批评主体的自谐以及与不同批评学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在这一套丛书中，我们尝试从各不相同的切入角度开展研究，有在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直接讨论文学批评理论的，有从语言学、符号学出发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角的，也有从文学思潮或地域文化方面侧重批评实践的。我们想以这样的探讨为前提，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实际的碰撞中，拓展思维空间。也许，这比单纯形而上的冥思苦想、比单纯形而下的实际操作，有更多接触、发现新知新见的机会。丛书的作者对所选择的课题，都已经投入多年的精力，发表过若干阶段性成果，分别获得中华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或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本丛书既是各人课题的后期成果，又是相互的呼应协作，还是我们这一个研究的群体下一步理论上整合的准备。

无论是在本丛书的写作商讨中，还是在平时的研讨活动中，我们这个群体的学术见解都没有取得过完全的一致；除了继续内部的切磋辩论之外，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期望得到校外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1996年3月22日

于武昌桂子山

序

於可训

上个世纪 40—70 年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历史年代。这个年代的特殊性，就在于这期间的文学不但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深受战争心理的影响，而且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中，又因为整个国际冷战背景的关系，被纳入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制之中。在这样的体制中，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者在有些时候还难免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对于向以追求心灵自由和创作自由自命的作家来说，自然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在接受这种限制和约束的过程中，尽管有些作家看似自觉自愿的，实际上都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和痛苦的内心斗争，更多的作家则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与这种限制和约束发生龃龉和冲突，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事件，甚者如“文革”期间还造成了许多人身伤害。因为这期间的作家有这些复杂的遭遇，所以近 30 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就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后来有论者又越过文学研究的边界，把这个问题引向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时间，竟因为知识分子问题的升温而成为一个热点。在这种研究的热潮中，虽然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反思逐渐深入，敞开了一些封闭已久的文学史空间，对有些个体及其文学活动的功过是非，也给予了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评价，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研究因为所注重的主要是作家

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而不是他们的创作活动及其成果，所以渐渐地也便脱离了文学研究的本体，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或人生历史研究的一个片断。

毫无疑问，李遇春博士的这部专著，也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作家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只是，他让这种作家研究回到了文学的本位，而不是游离于文学研究之外。换言之，他不是在这期间的作家所遭受的某些不公正的待遇，向社会寻求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也不是像流行的知识分子研究那样，按照某种西方标准，确认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而是旨在通过作家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在应对文学环境变化的诸多复杂的选择中，是如何处置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规范”之间的关系，以此来阐明一种文学秩序（或曰制度）的建立对作家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因此而造就的各种文学立场和话语形态。为了深入地阐述这个问题，作者尝试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结合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这期间的文学中权力（包括“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如何影响文学主体的心灵，主体又如何通过各自的话语方式对权力的影响作出回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精神症候式分析。虽然这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的使用，有时难免给人以陌生之感，但因为作者并非胶柱鼓瑟地生搬硬套，而是在精研其原理的基础上，酌用其方法，且不主一门一派之理论，而意在融会各家各派之学说，因此这些理论和概念的运用，从总体上看，并不显得如何的格涩。相反，在我看来，倒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用一句如今在学术界流行的行话说，这也正是它的独特的创新之处。

说到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让我想起了与本书有关的一点往事。十年前，遇春在我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创作心理，所用的方法，除作为基础的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外，当时所能借用的新方法，不外乎是时兴

过一阵子尚未完全过时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心理原型批评理论。这篇论文共有三章，通过答辩后拆分为三篇独立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本专业的一些学术刊物上，有的还被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选刊转载，说明这篇硕士论文是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的。毕业后，遇春继续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把张贤亮的研究个案推而广之、扩而大之，由一作家及于一时期或一时代之作家，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依旧是：一时代的政治如何因为对作家的影响、限制和压抑，在作家身上积聚为一种心理能量，这种心理能量得以释放出来，又如何转化为一种创作的动力，成就一个作家的创作或一时代之文学。这不过是在他写作硕士论文时，根据作家张贤亮的实际情况，我给他的一点简略的提示。但这点经验式的提示，在他写作博士论文时，却被他发展为一种自觉的方法。在最后确定以上个世纪40—70年代作家的话语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之后，遇春一面对这期间一些较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作家，逐一进行个案研究，一面精研当时正成为译介热点的福柯的理论，及与之相关的“西马”理论，在他所熟习的精神分析等心理原型理论的基础上，寻找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三年后，遇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优秀”通过答辩，旋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在完成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不经意间竟成了福柯研究的行家里手。据说，他在毕业后供职的大学，还应命向研究生作过福柯的专题讲座，听者有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有这等胆量，足以说明他的福柯研究功力不浅。在文学研究的问题上，我这个人向来不主张迷信理论或方法，不相信理论和方法就是万应灵丹，但对遇春这种活用理论、方法，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研究的拓深开新，我还是深表赞赏的。

遇春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才思敏捷，结想细密。这是我对他在我门下问学六年所形成的总体印象，也是我对他这部由博士

论文写成的学术专著的一个总体印象。既属印象，就难说准确，且因有一层师生关系，亦难免有私。既然如此，这点评品人物的快意，就只能交由阅读本书的读者去体味了。

2006年8月写于北京

摘 要

本书将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红色文学秩序”）进行研究。主要在共时性的话语结构层面上，本书集中探讨了置身于红色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这种话语困境植根于其心理人格困境，而后者源于其文化困境。

导论部分对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展开必要的论析。本书的研究视角为“权力（文化）—主体（心灵）—话语（文学实践）”。相应的研究方法为：权力的视角与心灵的视角相结合，文化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与心理分析相结合。为此，导论阐述了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权力与主体的关系，以及权力、主体与话语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还重点界定了“权力”、“主体”和“话语”等核心概念的特定内涵。本书中的“权力”主要是指规范化权力，而不是制度化权力；“主体”是指深层心理学意义上的、具有多重心理人格结构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理性主体；“话语”介于共时性的“语言”和历时性的“言语”之间，它是—定社会的语言文化规则系统与特定生命个体的言语欲望共同作用的产物，即多重主体的具体言说实践。这样，本书的研究视角可以进一步表述为：由于主流文化规范的运作，不同的创作主体的心理人格结构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嬗变和调适，这一切在他们的

文学话语实践中有着或隐或显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解读各种文学话语症候，来寻找创作主体内在的心理症结，进而深化对主流文化（文学）规范的反思。

第一章论述建构红色文学秩序的历史语境，即五四落潮后现代中国文学逐步发生的话语转型现象。在引入福柯的知识型（“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本章重点论述了五四启蒙知识型及其文学话语范型的初建，以及现代中国文学从启蒙文学话语范型转换到革命文学话语范型的内在思想线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话语生产的价值基点，从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本位转向了意识形态化的“工农兵”的集体本位；二是构造文学话语的标准方法，从以“经验”和“事实”为出发点转向了以“立场”或“世界观”为出发点，也就是从“经验理性”转向了“先验理性”；三是文学话语生产的中心法则，从“人的文学”转向了“阶级的文学”。

第二章围绕“革命文艺生产范型”，具体分析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从总体上看，当时的主流话语主要运用三种不同性质的“话语战略”来规范知识分子（作家）的文学写作，从而形成了一种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第一种是话语外部的“排斥程序”，它主要通过设置文学话语禁区和构筑文学话语等级，从广度上限制创作主体的话语空间。第二种是话语内部的“提纯程序”，它主要通过设定一种具有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倾向的演绎型思维定势，从深度上限制创作主体的话语空间。第三种是话语生产的“组织程序”，不同于前面的两种规范化权力，这是一种制度化权力，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的规约，并最终确立了一种计划性的文学生产体制。

第三章集中分析置身于红色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的主导性话语屈从立场。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话语立场是创作主体屈从于主流文化（文学）规范的压抑而逃避内心真实自我的

一种心里防御策略。为了缓解巨大的文化心理焦虑,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竭力向主流文化秩序表示认同,从而在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普遍形成了一种集体化的革命理想人格(“超我”),由此生成了革命英雄情结。本章不仅揭示了这种心理情结的普遍性,而且深入剖析了这种心理情结的心理发生机制,以及主流作家在创作中运用理想化策略来实现心理认同的具体方式。由于这种“社会无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情结还可以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被归结于一种文化恋父情结,因此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恋父情结进行了文化阐释,并清理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渊源,然后重点剖析了文化恋父情结在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从人物形象塑造的非性化倾向中解读出一种文化阉割情结,从男性人物形象塑造的父性化倾向中破译出一种父权崇拜心理,而这两种深度心理倾向在本质上都属于文化恋父情结的心理衍生物。最后,本章还对当时中国文学中的“完美主义”人物形象展开了批判性的心理分析,目的是为了透视当时中国国民(包括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一种典型的完美主义社会性格的内在弱点。

第四章集中分析置身于红色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被压抑的话语反抗立场。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话语立场意味着创作主体坚守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人格,并试图抗拒人格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化的超我人格。本章首先概括性地梳理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英雄情结(“知识分子自我情结”)在革命文化语境中逐步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历史心理进程。在此基础上,本章重点剖析了20世纪40—70年代中国作家为了反抗主流文化规范的压抑而主要运用的三种心理内部防御策略(自我投射、体验“他者”和回归自我),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学话语实践中的表现形态。自我投射在叙事文学话语中主要以知识分子主人公为艺术载体,在抒情文学话语(主要是抒情诗)中则以多样化的诗歌意象为艺术载体。体验“他者”中的“他者”主要

包括当时流行的“中间人物”和一系列被人忽视的女性“边缘人物”。直接性的回归自我有心理独白和心灵对话两种形式，它们主要表现在部分地下诗歌和地下小说中。最后，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英雄情结可以被追溯为一种文化审父情结（意识）的心理派生物，因此，本章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作家被压抑的文化审父情结（意识）在20世纪40—70年代文学话语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在地下诗歌话语中集中表现为对神圣意象的颠覆，而在叙事文学话语（包括地下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上的现代性父子冲突叙事。

第五章集中分析置身于红色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的一种特殊的话语忏悔立场。从深层心理功能来看，这种话语立场具有双重性。相对而言，它在创作主体的理性（意识）层面上往往表现为对其真实自我的逃避心理，也就是对集体化的理想人格（超我）的屈从，而在创作主体的非理性（无意识）层面上，它又常常表现出对其真实自我的不同程度的坚守心态。本章首先分析了忏悔作为一种话语仪式所内含的某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等级结构，其中既有学理性的辨析，又有实证性的文本分析。随后，通过对不同体裁的革命文学话语的解读，本章重点剖析了潜藏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的群体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的政治忏悔情结。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探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在自尊与自卑之间痛苦徘徊的隐秘心态，而这种矛盾心理其实正是他们的政治忏悔情结的必然产物。最后，作为一种对比，本章简要地探讨了人道主义忏悔话语在当时地下文学中的悄然回归现象。

第六章集中分析置身于红色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疏离立场。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话语立场意味着创作主体因不满于主流文化规范的压抑，试图寻找自身被放逐的真实自我的精神心理倾向。然而，此时他们找到的并不是其真实的自我人格，而是“本我”，它具有一种潜在的“返回子宫”、回归自然